

《中鉴录》的编辑、刊布与存藏

周保明

内容提要:晚明时期,宦官专权益盛。朝野人士或以引导宦官言行之向善,或企图结好宦官势力争夺朝政话语权,或出于以一己学说俘获君心之私念,纷纷致力于历代宦官传记文献的汇辑与评论,思想家王畿所辑《中鉴录》即是其中之一。《中鉴录》七卷,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为明刻本,藏故宫博物院。日本国立公文书馆“内阁文库”藏有明万历三十九年刘成跋刊本五册。两本同版,故官本后印,有多处剜改、删削,主要表现在目录、序跋、正文内容等方面,剜、删特征一贯,版片配补痕迹亦相当明显,内阁本则较完整地保存了该书原貌,其在日本的递藏轨迹相对清晰。《中鉴录》的编辑初衷乃寄望有助于宫廷宦官教育,且在万历朝廷产生了一定影响,也为晚明政治思想史和宦官史研究留存了宝贵史料。

关键词:《中鉴录》 王畿 故官本 内阁本

《中鉴录》,亦称《中官中鉴录》,是明代王畿辑录并加以评论(白云“间以数语引而伸之”)的历代宦官传记,卷一为“中鉴答问”和“古今沿革”,卷二至七分忠、贤、让、劳、能、准、逆、乱、奸、横、贪、残十二门,共汇编91人事迹,总之曰善、恶两类,评论文字以“外史氏曰”附于各传后。学界有人以为此书亡佚^①,但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该书明刻本一种,故宫博物院藏,业已影印出版,日本国立公文书馆“内阁文库”亦藏有明万历三十九年(1611)刘成跋刊本五册(下文有引用《中鉴录》者均据此本)。

^①如彭国翔就认为,“这部书未能流传下来,不见于各种书目”(《王龙溪的〈中鉴录〉及其思想史意义》,《汉学研究》第19卷第2期)。许宗兴在谈到王畿著作时也曾指出,《中鉴录》之版本、实际内容均因书已亡佚而无从考知,甚至因《明史·艺文志》未加著录而得出“此书在当时或已亡佚”的结论(《王龙溪学术》(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辑刊丛书),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,2008年,第16页)。

一、《中鉴录》的编辑

王畿(1498-1583)字汝中,浙江山阴(今绍兴)人。嘉靖十一年(1532)进士,明朝中晚期阳明学派的代表人物,为极富盛名的阳明理学宣讲者,官至南京兵部主事,终因学术思想不容于主流而见黜。“畿既废,益务讲学”,四十馀年间足迹遍至江苏、浙江、湖北、福建等省,“年八十馀不肯已”,学者称“龙溪先生”^①。“所著有《龙溪先生全集》二十卷、《中官中鉴录》七卷、《大象义述》、《念庵冬游记》及诸会语行于世”^②。其中《中官中鉴录》之成书具有显著的时代背景。

明太祖曾严禁宦官读书识字,但面对宦官日益介入朝政大事各个环节(军事、外交、财政、司法、文书、记事等)的现实,主观上和客观上都需要对这一禁令做出改变,虽未曾明言,却心照不宣,因此洪武后期已有小宦官“攻习史书,日有进益”的记载,永乐时开始大量使用有文化的宦官入侍东宫,还出现了“令听选学官入教小内侍”的情况^③。

仁宣时期票拟制度形成,对宦官的识字能力、个人修养及政务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至宣德、正统间,司礼监开设内书堂(“内书堂者,授小内使读书之堂也”^④)。在教习人选方面,嘉隆之际出现了明显变化。根据《田亭草》一书的记载,“往时内书堂教习皆累资十年以上者,至华亭徐文贞公(徐阶)特用资浅者为之”。面对质疑,“公意谓资深词臣交游广,又或分校礼闱、典试两畿,著录称门徒者众,诸大奄、中奄恒缘而请托,势不得固辞,因以为名行累,又有阶而媒进者”。隆庆二年,《田亭草》的作者、戊辰科榜眼黄凤翔被授为翰林院编修,领命教习宦官。黄凤翔任内书堂教习,可谓尽心尽力,着手编辑前史宦官行事可为鉴戒者,汇为一书,“命诸小奄时时习读,间呼而问之”^⑤。这是辑录宦官传记用于宦官教育的开始。

明代中叶以后,皇帝怠政与宦官专权成为政治上的两大特征,常朝不举,经筵不行,宦官的作用越来越重要,其专权的弊病也日益突出。文人官僚们意识到加强宦官正规教育的重要性,同时也意识到归纳、总结历史上宦官的善、恶事迹以资借鉴的迫切性。伴随着宦官组织的衙门化和宦官教育的制度化,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共识,即必须通过提升宦官的文化素质和思想修养,来达到影响皇帝思想和行为的目的。另一方面,在党争激烈的晚明时期,争取、培植宦

①张廷玉:《明史》卷二八三《儒林二·王畿》,中华书局,1974年,第7274页。

②赵锦:《龙溪王先生墓志铭》,《王畿集》附录,凤凰出版社,2007年,第831-832页。

③黄瑜:《双槐岁抄》卷五《内府教书》,中华书局,1999年,第84页。

④何乔远:《闽书》卷八七《英旧志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,1995年,第2995页。

⑤黄凤翔:《田亭草》卷七《教内书堂记》,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第44册,北京出版社,1997年,第441-442页。

官势力，“使此辈知吾党之可赖”（王畿语），对于有抱负的思想家来说，是一种对阁臣权力制衡的期望。

王畿虽已致仕，但仍然关心朝政，关心对宦官的“驯养之方”，希望《中鉴录》的编辑对宫中宦官教育起到一定作用，达到“致良知”，影响宦官从而影响皇帝，使之“明圣学”的目的。据王世贞《吏部侍郎陶文僖公大临传》，正是在陶大临的建议下，内阁首辅张居正作《帝鉴图说》^①（是书上篇讲述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，下篇剖析历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祸），隆庆六年（1572）书成，进呈刚刚登基、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。这件事对王畿编辑《中鉴录》产生了直接影响，正如王氏在给耿定向的信中所述：“迩者元老有《帝鉴》，独中官无鉴，似为缺典。闲居无事，纂辑历代中官传，得其善与恶者若干人，录为《中鉴》，间以数语引而伸之，开其是非之本心，警以利害之隐机，使知所惩发。”^②在致朱越崢函中也说：“凡我大小臣工，守令有鉴，台谏有鉴，辅相有鉴，迩者复有帝鉴，独中官未有所鉴，似为缺典。不肖因纂辑春秋以下历代诸史宦官传，得其淑与愚者若干人，分为三册。”^③

神宗万历元年（1573），《中鉴录》稿成，当然王畿并不是“闲居无事”才致力于此的。其时神宗甫即位，张居正当权，在常朝不举、经筵不行、外廷进见有时的情况下，在对皇权缺乏有效制约手段的前提下，争取与皇帝朝夕相处的宦官势力，也是一条接近权力中心的理想途径^④。王畿说：“内馆之设，事几若微，于圣躬得养与否，所系匪浅。”^⑤“若得此辈回心向主，比之外廷献替，功可百倍”，“吾人欲引君子于道，舍中官一路，无从入之机”^⑥。从这个角度讲，“王畿作《中鉴录》，非以备中官之鉴，以备人主之鉴也”^⑦。王畿本人深信此点，他在给陶大临的信中明确提出影响小皇帝必须“内外兼攻”的观点：

天子新祚，睿知夙成，童蒙之吉，执事任蒙养之责，其功贵豫。窃意治有大本，有大机。大本莫切于明圣学，大机莫切于和人心。圣学明，蒙养之功始有所就；人心和，协恭之化始有可成。养正之术，全在内外得人辅理。在外，须复祖宗起居注旧制，访求海内忠信文学之士数辈，更番入值，以备顾问，以供燕游。在内，所赖全在中官。盖幼主深处宫闱，舍此辈无与周旋

①焦竑：《国朝献征录》卷二六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101册，齐鲁书社，1997年，第344-347页。

②《王畿集》卷十《与耿楚侗》，第240页。

③《王畿集》卷十《与朱越崢》，第256-257页。

④林丽月：《击内抑或调和：试论东林领袖的制宦策略》，《（台湾）师大历史学报》1986年第14期。

⑤《王畿集》卷十一《答张阳和》，第285-286页。

⑥《王畿集》卷十《与耿楚侗》、卷十一《与赵澱阳》，第240、288-289页。

⑦方以智：《浮山文集前编》卷四《曼寓草上·中涓议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5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472页。

承事，导之以正则吉，纳之于邪则凶。吉凶之机，不可以不慎也。此辈伎俩，染习虽深，然未尝无是非本心，利害未尝不明。吾辈无耻者，方倚以为速化之术，其子子自好者视此辈为异类，若将浼己，绝不与通，则又若矫枉之过矣！今日欲事蒙养，须与此辈通一线之路，诚心相处，开其本心之明，示以祸福利害之机，使此辈知吾党之可赖，当有忻然悦而趋向者。得此辈办几分好心肠，随时引沃辅理之益，奚啻外廷百倍！^①

类似的意思在给耿定向与朱越崢等的函件中（均见于《王畿集》卷十）亦有表达。《中鉴录》卷一的《中鉴答问》则对上述意图做了进一步阐发，并特别强调说开国初顾问团体完备，“今皆无之”，即使经筵讲席常常举行，收效亦不会明显，而目前的情况更不容乐观：“夫外庭之臣逖而情疏，宦官宫妾昵而情亲，情疏则志睽，其言有所讳而难尽，亲情则志应，其言无所疑而易入。”“周公恤于缀衣、虎贲”，立意深远，“予之《中鉴》，窃有附于斯义”。“予既纂宦者传，并以古今沿革揭诸左方，用垂永鉴云”（《中鉴答问》第十二则）。

王畿“身处江湖而不忘廊庙”，自谓编辑《中鉴录》是“杞人忧世之微忱”，“杞人忧世之苦心，纳牖之微机”。他说：“中鉴者，中官之鉴也”，“余读古今宦者传，历观诸人祸福之由，未有不自己求之者。由今观昔，宜其有所鉴而惩矣”（卷首《中鉴录序》）。讲求“养之之道”，对“蔽于欲、沿于习”、“由之而不自知”、“譬诸睡梦之人”的宦官们“开其是非本心，使知善恶之报皆心所造”，“援古证今，指其是非之良，疏其利害之端，彼将自知善之不可不为、恶之不可不去矣”，“此吾《中鉴录》之所以由作也”（《中鉴答问》第八则）。

在《中鉴录》的影响下，晚明时期形成了一股辑录宦官事迹的热潮。有载可考者如张世则《貂珥史鉴》四卷、《中贵芳摹》一卷，李贵《思齐录》，徐学聚《历朝珥鉴》四卷，吴麟征《党鉴》四卷等^②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亦著录《貂珥史鉴》的明刻本和明万历刻本两种，另有毛一公《历代内侍考》（十四卷）清抄本三种、李腾芳《宦寺考》（八卷）李文田跋吴道行刻本和顾尔迈《明珥彰瘡录》（一卷）清抄本。以上诸书中，张世则《貂珥史鉴》影响最大，“鉴中正条，一皆以经史、《通鉴纲目》为据，余见诸野史外传者，或事有相类而人可等夷者，则分注考以别之”，“褒贬断制皆引用先儒之格言，正论未敢以臆说杜撰，其间有缺略而意未尽者，乃窃以己意附于后，更着评论字于其端”^③。同时还可以考见，《中鉴录》与《貂珥史鉴》产生过明显的“交集”（详后）。

①《王畿集》卷九《与陶念斋》，第223页。

②万斯同：《明史》卷一三四《艺文二·户部》“故事类”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326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334页。

③张世则：《貂珥史鉴》“凡例”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98册，第703页。此书《四库全书》以两淮盐政采进本收入存目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据国家图书馆藏万历刻本影印。

二、《中鉴录》的刊刻与流布

《中鉴录》完稿时,已是七十六岁的王畿四处写信、托人做宣传推广,请同道和朋友们作序甚至梓行。如在给陶大临的信中说:“不肖隐忧不忘,眠食之外,以心代力,纂辑《中鉴录》三册”,请陶“择此辈可与言者,无意中授以一册,递相传玩,少知劝阻,兴其善念,拂其邪心”。给曾见台的信中说:“不肖杞人之忧,以心代力,博采历代中官传,得其善与恶者若干人,录为《中鉴》,并附数语,开其是非利害,使知所劝阻……如以为有补世教,可跋数语,图刻以传,亦芹曝之苦心也。”王畿托王阳明子龙阳将《中鉴录》带至京城,或让在京同道前去索览,或让龙阳登门奉送,请大家提意见并推荐传布。如给邹聚所说,书寄放于王龙阳处,“可亟索观,或誊写数幅,请正诸同志,亦千里交修之助也”^①。给朱越崢说:“有稿在王龙阳处,吾丈可索观之。若以为有补世教,可留意披抹,与同志相参,以广其传。如以为迂狂,则置之可也。”又如给耿定向说:“录成,托龙阳奉览。若以为有补世教,须吾丈以数言弁首,刻布以传。”给赵澱阳说:“吾弟可细细披抹笔削,以润色之。若以为有补世教,梓而行之,与诸鉴并传,示法于将来,未必非格心之助也。”^②诸如此类,王畿心情之急切溢于言表。

万历七年正月十九日,翰林修撰张元忬被命于内书堂教书^③,王畿即将《中鉴录》转呈,以备其讲习之用。时任福建巡抚耿定向看到《中鉴录》后,也力促其成功,致信徐用检云:“顷承贵乡龙溪翁见惠《中鉴录》一部,云缘为阳和(张元忬)殿撰近教内书堂编者^④……此编须贯彻此辈心髓,乃有益也。丈倘有间,更为润色,寄去阳和,于世道或亦有补。”^⑤张元忬的确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:“子苾(张元忬)曰:此辈他日在天子左右,关主德不细,奈何不预教之?乃观《中鉴录》,亲为条解,用示劝惩。又作《训忠》诸吟,令歌之,冀其有所感悟。”^⑥不久后,张元忬不得不离开内书堂教习之职,王畿遂对《中鉴录》在内书堂的命运表现出无比担忧,致信称:“既膺起居之命,内馆主教势不得兼”,“所云《中鉴录》,未敢为不朽之传,区区两三年纳约苦心,庶几自尽……不知相继

①邹德涵:《邹聚所先生外集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157册,第402页。

②《王畿集》卷九《与陶念斋》、卷十二《与曾见台》、卷十《与朱越崢》、卷十《与耿楚侗》、卷十一《与赵澱阳》,第223、304-305、256-257、240、288-289页。

③《明神宗实录》卷八三“万历七年正月乙丑”条,上海书店,1982年,第1749页。

④从《中鉴录》成书和张阳和任职教习两个时间节点看,此说不确。

⑤耿定向:《耿天台先生文集》卷五《与徐鲁源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131册,第140-141页。

⑥朱赓:《朱文懿公文集》卷十一《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阳和张公行状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149册,第436页。

主教者能悉领此意、不作寻常套数挨过否？”^①

王畿还认为，内书堂的宦官培养出现了问题，官僚同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因此他希望通过《中鉴录》的影响，加之内书堂讲习注重教养方法，使小宦官们知道自爱，相信和依靠官员，“不欲自外于缙绅”（《中鉴答问》第十一则）。在这方面，《中鉴录》的影响显而易见。万历二十年，四川按察司佥事张世则奏进《貂珥史鉴》，礼部表示其最好能和先前行用的《中鉴录》一起定为“课程”，称“我朝自宣德以来，始立内书堂，专用翰林院官以教习之。其所诵读者，有《忠鉴录》一书，法戒昭然已备。今四川按察司张世则所进《貂珥史鉴》，臣虽未观其书，而据其疏中所称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，实与《忠鉴录》相发明”，恳请万历皇帝“置之座右，留神省览，如果所言可采，乞敕该监缮写翻刻，印发内书堂，人给一帙，俾与《忠鉴录》俱定为课程，日夜诵读，庶几口诵心惟，或可迁善而改过，内侍将有得人之庆矣”^②。

当然，《中鉴录》等书的“教材”作用和影响仍不宜被夸大。首先，小宦官至书堂学习有正规教材，“每给《内令》一册，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千家诗》、《神童诗》之类，次第给之。又每给刷印仿影一大张”，“凡有志官人，各另有私书自读，其原给官书，故事而已”^③。其次，万历十四年，礼部尚书沈鲤上《典礼疏》谈到宦官的培养，希望皇帝“特命儒臣撰集古今中官善恶事迹为一传，付与翰林官教习，使之各知忠主上、爱身家、保富贵之道”^④。倘若此前《中鉴录》已为教材，必不至此！再次，《貂珥史鉴》进呈后，民间传闻“上命留览，但不闻发付史局，人间亦无刻本，恐遂湮没不传，可惜可叹！”^⑤虽非实情，但足见其影响之局限。其四，天启元年（1621）九月，编修侯恪等十一人同时被命教习内书堂^⑥。同窗好友钱士升得知后，写信给他：“近闻有内书堂之命，此事殊有关系……窃以为古来宦竖可为法戒者，宜汇为一书，令小珥童而习之。豨豕之牙，尤易为力，年兄以为何如？”^⑦诸如此类，都是明证。

《中鉴录》成书后的刊刻，首推万历时期最著名的宦官孙隆。他是史有明载首位刊刻《中鉴录》的人。孙氏书法绘画极佳，擅长制墨。姜绍书云：“神宗游

①《王畿集》卷十一《答张阳和》，第285-286页。

②张世则：《貂珥史鉴》“礼部复疏”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98册，第699-700页。

③刘若愚：《酌中志》卷十六《内书堂读书》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97页。

④沈鲤：《亦玉堂稿》卷四《典礼疏·预教皇子之礼》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1288册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，第260页。

⑤沈德符：《万历野获编》补遗卷一《内监·纪述内臣》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883-884页。

⑥《明熹宗实录》卷十四“天启元年九月甲子”条，上海书店，1982年，第727页。

⑦钱士升：《赐余堂集》卷六《尺牍一·与侯木庵》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第10册，第486页。

情翰藻，及罗氏墨，中涓重资争购，等于圭璧焉。厥后织造内臣孙隆‘清谨堂墨’款式精巧，剂料极一时之选，曾进上方，神宗爱重之。”^①我们无法得知孙隆刻写《中鉴录》的具体时间，但从万历四年起的整个万历朝，孙隆基本上都在苏杭织造任上，至少到三十四年^②，并于万历二十七年兼任税监^③。孙隆写刻的《中鉴录》应存目于《内府经厂书目》中，可惜这部书目没有保存下来。

同时期的另一位著名宦官刘成，于万历三十八年主持了《中鉴录》的重校刊刻工作，刘成“刻中鉴录跋”云：

余闻鉴以照物，而丑者忘怒，谓无私也。然造化肖形，靡可移易。人性本善，返照则明审，能鉴于善而后从之，鉴不善而改之，不大愈于以铜为鉴哉？我皇上御极之初，元辅即进以《帝鉴图说》。方今圣学日新，登三迈五，则鉴于《图说》有明征矣。猗欤盛哉！乃若《中鉴》之纂，条分缕析，衮钺森严，所以觉吾侪之迷思，挈之以同归于善，意何微也！余虑其久而湮泐讹谬，爰重校而梓之，亦庶几乎不朽之传欤！

末题“万历辛亥日在寿星之次，关西刘成谨跋”。

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现藏刘成跋刻本全帙，品相尚佳，几无删改残缺，或为《中鉴录》现存的最早和唯一版本（“故宫本”实与“内阁本”同源，详后）。《中鉴录》书成至此次重刻，算来已近四十年，无法得知这些年间除孙隆外是否还有其他人另行刊刻，但事实是其“湮泐讹谬”情况严重。万历四十三年，刘成因参与“梃击案”而被处死。

《中鉴录》作为宦官主持下的内府所刊书籍，宫中存留，理所当然。宦官教育步入正轨的时期，其在内书堂、司礼监等机构或翰林甚至宦官之间的传播应该是普遍平常的。其后的私人书目著作，也有不少著录该书，如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、祁承燾《澹生堂藏书目》等。万斯同《明史》以祁氏书目、雍正《浙江通志》据黄氏书目各有所见，即能说明在黄、祁等私家藏书中是存在的^④。

入清后未见《中鉴录》刻本流传，亦未见在民间传布，它的性质与内容决定了这一点。原因可能三个方面：第一，内容为宦官传记，又为司礼监所刻写，被认为有辱文教。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云：“盖天禄、石渠之任而以寺人领之，此与唐鱼朝恩判国子监何异？明政不纲，此亦一端。”^⑤再如叶德辉也曾说：

①姜绍书：《韵石斋笔谈》卷下《墨考》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872册，第116页。

②万历年间，孙隆还曾征召人物画家周梦龙（起潜）绘制《帝鉴图说》（曹允源：《[民国]吴县志》卷七五上“列传·艺术一”，《中国方志丛书》华中地方第18种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，1970年，第1595页）。

③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十一月，“更苏常四府税监孙隆，以刘成代之”（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三六五“万历二十九年壬戌”条，第6839页）。

④徐乾学《传是楼书目》卷三云：“《中鉴录》七卷，明王畿，正德，四本。”（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20册，第746页）刊刻年代显误。

⑤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八七“史部”，第794页。

“司礼监所刻书见于《经厂书目》，世所传经厂大字本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，颇为藏书家所诋斥，非尽谓其校勘不精也。夫以一代文教之事，以奄人主之，明政不纲，即此可见。”^①既如此，由宦官递相传刻的宦官传记汇编当然不受欢迎。第二，在统治者的意识中程朱理学仍然占据统治地位。王畿毕竟是心学传人，《中鉴录·中鉴答问》满篇都是其良知思想表达和远大抱负的陈述，不能不引起正统思想家们的警惕。如前引耿定向给徐鲁源的信中即说“编中须隐编者姓氏为得”，极有可能就是顾及此点。第三，刘成犯事被杀。保留在宫中的《中鉴录》（即今传故宫本），删削了所有当朝宦官的事迹，隐去了序言末编辑者的落款，剝掉了刘成谈校刊经过的跋文，或即与此有关。幸而完好的刘成跋刻本传到了日本，才让我们了解到此书刊刻的实情。

王畿在日本阳明学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，日本学者对王畿思想的研究，成就足可称道，中纯夫才以《王龙溪先生全集》和《龙溪王先生会语》为基础，编撰了内容详实的王畿年谱，还特别就王的讲学地点、时间、经过等作过考证。王畿著作在日本的刊本，有明治三十六年（1903）日户胜郎据莫晋本编刻的《王龙溪全书》，汲古书院据丁宾本翻刻了《王畿集》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岛田虔次曾对王畿的部分会语和语录作过注解，作《王龙溪先生谈话录并解说》一文。1970年代则有以《王龙溪先生全集》第一卷为中心的日文译注本，即山下龙二《王龙溪先生全集抄译注及解说》。此外，荒木见悟和永富青地已对《中鉴录》和《大象义述》有所关注^②。此一背景提供了《中鉴录》东传日本的可能，至于这部流传并不广泛的宦官传记汇编是如何到达日本的，详情不得而知。

三、“故宫本”与“内阁本”的比较

故宫博物院物的藏书，是明清两代宫中遗留下来的，《中鉴录》为其中的“孤本”。《故宫珍本丛刊》影印出版时署“明刊本”（与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一致，下文简称“故宫本”），是根据“罕见与实用”的标准精选出的1100余种珍本图书中的一种。东传日本的《中鉴录》现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“内阁文库”收藏，署“明万历三十九年跋刊”（下文简称“内阁本”）。吴震在编校整理《王畿集》的时候已将中、日所藏王畿诸种著述的版本情况掌握得比较清楚，同样他也注意到了故宫藏《中鉴录》与日本内阁文库藏《中鉴录》的存在，并指出：“两本版式完全相同，然故宫本阙王畿自序的署名落款，而刘成跋则有目无文，页面间有文字脱落，似非善本。”^③

①叶德辉：《书林清话》卷五《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103页。

②方祖猷：《王畿评传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456-457页。

③《王畿集》“编校说明”，第1-5页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吴氏将“中鉴录序”和卷一之“中鉴问答”做为“逸文”辑佚（第791-798页），未知何故。

的确如此,故宫本与内阁本的版式上特征完全相同:字体一致,半叶九行,行二十字,四周双边,单黑鱼尾,版心题“中鉴录”和卷次。目前所见的故宫本序文首页下曾有一款方印,惜遭人为涂改,无法辨认,卷一首尾也各有一阴文方印模糊不清,卷二首有先大后小三款方印、卷三首尾各有一阴文方印(首小尾大)、卷四首两款阴文方印尾一款阴文方印、卷五首三款方印、卷六首一款方印、卷七首三款方印尾四款方印,卷二、五、六尾残,所有印文全部无法辨认,外观上看则有相同亦有不同。内阁本封面有“昌平坂学问所”阳文钤印,序文首页依次有“钦房印”、“佐伯侯毛利高标字培松藏书画之印”、“浅草文库”和“日本政府图书”等阳文方印,卷末钤“昌平坂学问所”和“日本政府图书”阳文印。故宫本序文无落款,内阁本“中鉴录序”末句紧跟“山阴王畿识”五字。故宫本目次有“跋”而文已阙,内阁本跋文完整(已见上引),半叶六行,行十五字,凡168字,跋尾印阳文“刘成之印”和阴文闲章“读书中秋”。此外,内阁本尚有不少朱笔眉批和圈点。

从钤印入手,内阁本《中鉴录》在日本的递藏经过清晰可见。此书原为九州岛佐伯藩第八代藩主毛利高标旧藏,至文政十一年(1828),由其孙毛利高翰献给幕府,庋藏于幕府官学“昌平坂学问所”。“昌平坂学问所”,俗称“昌平黄”,是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儒学研究中心,源于江户时代宽永九年(1632)、由日本朱子学派创始人林罗山建于上野的“先圣堂”(孔庙)。《中鉴录》被纳入其藏书显在情理之中^①。昌平坂学问所的藏书约11万册,其中汉籍5.9万馀册,大部分藏书在明治五年(1872)并入书籍馆,明治八年归为国立“浅草文库”藏书(“浅草文库”被看做是保管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“昌平坂学问所”所有书籍的图书馆)。明治十七至二十四年间,“浅草文库”藏书并入“内阁文库”^②。内阁文库中重要的3万册图书,为永久保存,而于明治二十四年移交宫内厅图书寮(二战后改称宫内厅书陵部),馀下的内阁文库藏书,成为昭和四十六年(1971)新设国立公文书馆的主要藏书^③。

比较发现,故宫本乃是内阁本剽改后的重印本,在目录、序跋、正文内容等

①元禄三年(1690),幕府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将“先圣堂”搬迁,改称为“大成殿”,并将大成殿及附属建筑总称为“圣堂”。宽政九年(1797),幕府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重新进行了扩建,将圣堂及全部校舍更名为“昌平坂学问所”,直属幕府管辖,成为幕府最高的学府。明治维新后,此处一度成为日本文部省的办公场所,大成殿成为博物馆。

②明治六年(1873)在太政官属下设置了“文库挂”(即图书馆股),明治十七年改为“太政官文库”。明治十八年废太政官,立内阁,遂改称为“内阁文库”。

③真柳诚、王铁策:《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中国散佚古医籍》,《中华医史杂志》1998年第2期。

方面有充分体现,且有大量删削,特征一贯,版片配补痕迹亦相当明显^①。删改删削的内容也就成了内阁本与故宫本的差别,下面梳理故宫本主要删改、删削处如下:

序言部分:序言末尾“山阴王畿识”五字。

目录部分:卷二之“明怀恩 张永”,卷三之“金英 兴安 覃吉 陈准”,卷四之“明阿丑”,卷六之“明王振 明梁芳”,卷七之“明汪直 刘瑾”。

正文部分:卷第二十五至十九叶明怀恩传、张永传和“外史氏曰”一则(《故宫珍本丛刊》未加说明)。

卷三第二叶 b 面后八行至第四叶 a 面前六行明金英传、兴安传、覃吉传、陈准传和“外史氏曰”一则;“让类”标题二字。

卷五第二十九叶“外史氏曰”一则和“王守澄”开头六行 120 字;第三十九叶“唐杨复恭”中间 360 字;第四十二、四十三叶宋任守忠传末两行、“外史氏曰”一则两行与明曹吉祥传、“外史氏曰”一则。

卷六第二十一叶第三行至二十六叶首行明王振传及“外史氏曰”一则,并将两叶剩余文字补缀一版;第三十二叶后四行至第三十三叶(三十二叶补空板三行)明梁芳传和“外史氏曰”一则。

卷七第十五叶 b 面后四行至二十三叶 b 面前五行明汪直传、刘瑾传和“外史氏曰”一则;第二十三叶 b 面末四行补为第十五叶 b 面末四行。

书末:刘成“刻中鉴录跋”一百六十八字。

《貂珣史鉴》有大量的本朝宦官事迹,卷六“沿革”部分还专设“皇明宦官制”一篇,传世版本中均得以保全。《中鉴录》本于“我国朝之善与恶者亦分载若干人”^②,且成书又在《貂珣史鉴》之前,影响和地位不相伯仲,遭遇却完全不同。由上可知,故宫本《中鉴录》被删掉的内容,主要是明代十一位宦官的事迹,可以断定删改是明代本朝人所为。至于序首印章及序尾落款“山阴王畿识”被删,究其原因,一种猜测是包括“王畿”在内的明代信息均遭消灭;另一种猜测则是针对王畿本人,即其思想学说受到排挤以至于彻底失势,“引君子道”终成空梦一场。关于后者,其实早有先兆,正如耿定向在肯定该书作用、请徐鲁源“更为润色,寄去阳和”的同时,并不忘提醒“编中须隐编者姓氏为得”。

【作者简介】周保明,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。研究方向:明清史、明清历史文献。

①学者指出,删改旧版主要出现在一书的后印本中,在增修本、翻刻本、删存复刊本中也有这种情况。后印本删改校正初印本文字,则又有删改序文、卷端题名、卷端著者名、卷端卷末校刻人名与朝代、牌记、避讳字、卷次、目录、正文文字等多种表现形式(郭立暄:《古籍版本中的刻改旧版现象(上、下)》,《图书馆杂志》2002年第10、11期)。

②《王畿集》卷十《与朱越崢》,第256-257页。